

內蒙古文史資料

第五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內部發行)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65年·呼和浩特

編輯 凡 例

一、本選輯印行的目的在於保存和積累歷史資料，特別是有關本自治區的史料，並推動徵集和撰寫工作的開展。選刊的稿件大部分都是作者的親身經歷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由於每個撰寫者是從不同角度來敘述的，都不免有一定的局限性，內容可能不盡翔實，觀點不可能完全正確，因此，只在內部作為不定期刊物發行，借供研究歷史和地方文獻者的參考。

二、本選輯所選的資料，主要包括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歷史時期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教育、宗教、民族、社會生活、歷史人物等各方面的史實。撰寫可以不拘體裁，不求完整，使用蒙漢文為主，必要時也可以使用其他文字，只要真實具體反映歷史事件的真相的，均可選入。

三、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歡迎讀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選錄、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對來稿的原意則保留不動。

目 錄

“百灵庙蒙古自治运动”回忆片断

-德穆楚克栋鲁普 (1)
- 德穆楚克栋鲁普与傅作义爭夺鴉片过境稅.....任秉鈞 (21)
- 云继先部百灵庙武装暴动經過.....任秉鈞 (24)
- 綏境蒙政会始末記.....經革陈 (29)
- 德穆楚克栋鲁普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結
.....哈斯瓦齐尔 (39)
- 回忆在伪蒙疆政府时期.....奇天祥 (55)
- 奇子祥刺杀奇文英的前前后后.....刘映元 (82)
- 我刺杀奇文英的前因后果.....奇天祥 (90)
- 关于刺杀奇文英案两文的补充.....奇尙斌 (118)
- 奇文英的一生.....白凤岐 (125)

国民党反动派在河套地区的最后掙扎

- 我任伪安北县长期間的片断回忆.....王元魁 (147)

記傳部印刷厂伪造人民币事·····	潘佳緒(168)
記蔣雁行任“綏远都統”期間的几件事·····	关鍾麟(173)
我所知道的“长头发教”·····	溫立中(192)
汪容昌和他創办的蒙文书社·····	白彥巴图(203)

“百灵庙蒙古自治运动”回忆片断

德穆楚克栋鲁普

一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四省，内蒙古东部各盟旗也随之淪陷，从而日寇又向西部各盟旗伸其侵略的魔掌，于是与热河接壤的錫、察两盟便首当其冲，以致人心动荡，惶恐不安。适在这年冬，蒙古各盟部旗联合驻京办事处处长兼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吴鹤龄，将他一手制定的“蒙古各盟部旗组织法”呈请国民党中央政府明令公布，我当时是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兼錫林郭勒盟副盟长，錫林郭勒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索王)因病请假，由我代理盟长职务。我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就托滂江电报局长徐茂候代拟电报稿，盖上盟长大印，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拍发，反对吴鹤龄的这个“组织法”。同时我派錫林郭勒盟驻张家口办事处处长朴英达赶赴北平面见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洽请拨给枪枝弹药等物，并联络包悦卿、贺喜业勒图默尔根

（号額伯，即小卓王）、达密林扎布（太仆寺旗前任总管）等，以蒙古旅平同乡会的名义也致电国民党中央政府，一面反对吴鶴齡的“組織法”，一面吹捧我“素孚众望，洽順輿情”，应出任蒙旗宣撫使。包悅卿、达密林扎布二人并到南京活动，宣传我握有五千騎兵，是蒙古具有实力的人物。大吹大擂了一番。

这两次电报的拍发，和包悅卿的吹捧，引起蔣介石的注意。一九三二年秋，蔣派他的亲信桂永清（当时任軍官訓練班主任）和軍政部到察盟以枪換馬的余玉琮、彭秉离等前来我旗（苏尼特右旗）訪問，这时包悅卿也由南京北返，陪伴桂永清一同前来。桂永清对我是恭維备至。包悅卿曾将蒙古旅平同乡会电請派我出任宣撫使事和桂永清談了，桂对包悅卿說：“我看德王是个年青有为的王爷，宣撫使是老年人干的事，他干这个干嘛，依我之見，应当組織軍隊，扩充实力，在蒙旗先組織一个騎兵师或旅，当一个中将师长或旅长，不比干宣撫使好嗎？”包悅卿当将此話轉告我，我当下表示首肯。桂就給蔣介石打电报，并将电报原稿交由包悅卿轉与我看，全文記不清了，仅記得有“将来收拾蒙事者必属此君（指我）”一語。桂对我这样重視和吹捧，使我感到无上的欣慰。嗣他又表示想去看索王，我就派我的专用汽車把他送到烏珠穆沁右旗。他回来向我說：“我看索王凝神注目看人的神气，靜听別人談話的态度，是一个具有成見，十分固执的人，可能对你作些新的事情有障碍，希望你注意及之。”

当他临行时，又对我說：“靜候佳音吧，蔣委員長可能召見你。”

果然他走后不久，蔣介石就电召我前往武汉相見。我接到电报后，认为机不可失，就偕同朴英达賴、韓凤林、丁我愚等前往武汉。路經北平时，曾去面見张学良，张即指示鉄路局为我等一行特备专車一輛，并派蒙旗处处长袁庆恩率同宪兵四人护送。到武汉后，行营招待我們住在璇宮飯店，次日即前往行营見蔣。关于桂永清所說組織蒙古騎兵之事，未作詳談，囑我和秘书长楊永泰、參謀长曹浩森接洽。我見蔣后，就令韓凤林拟具蒙古騎兵师編制計劃和所需要的武器，送交行营办公厅。嗣又由楊永泰和曹浩森接見我，說給我“蒙古保安統監”的职务，我当下想到，索王是錫林郭勒盟保安长官，我如担任保安統監的职务，地位就在索王之上，可能引起索王的不滿，不如担任蒙古騎兵师长又实惠又相当。当向楊、曹表示不愿接受說：“我此次来見委員長，不是专为要官而来。”話虽漂亮，言甚刺耳，楊永泰聞听之后，馬上表現不甚愉快的神气，沒有再作什么回答，我就辞出归寓。

嗣聞招待我的韓副官說：“蔣委員長要去长沙視察工作。”我为了表示拉近乎，亲到长江岸上送行，不意到岸送行者，仅有武汉警察局长陈希曾。接着楊永泰、曹浩森等宴請我，还邀請我坐飞机环繞武汉上空，又招待我参观汉阳兵工厂、长江上的軍艦、黃鶴楼等名胜古迹和武汉大学各处。

当时武汉小报上曾登有“带着油松大瓣子的德王，在武汉大出风头”的消息，被行营給以停刊多日的处分，表示对我的“尊重”。参观各处后，行营秘书邓文仪前来璇宫飯店見我說：“关于編制蒙古騎兵师事，委員長指示以后再行考虑，至請发武器一节，答应拨給机关枪四挺，步枪数百枝，可在此具領，另拨迫击炮 两 門，須到南京軍政部洽領。”我遂派丁我愚前往行营軍械部門領到机关枪四挺，所发步枪数百枝，因系破旧之物未即具領，請再补发新的枪枝。

在武汉告一段落后，留下丁我愚洽办未完之事，我就偕同补英达賴、韓凤林等返北平，依据蒙藏委员会关于“重选盟旗代表，改組办事处”的命令，进行組选代表，反对吳鶴齡之事。这时除錫林郭勒盟已确定郭尔卓尔扎布、补英达賴为代表外，烏兰察布盟也确定拉希色楞为代表，伊克昭盟确定僧格林沁为代表，并均已先后到达。其他各盟旗代表就在北平酝酿組选，結果又确定賀喜业勒图默尔根、多尔吉为哲里木盟代表，呼、昭两盟因既已淪陷，又无适当人选在北平，沒派代表参加。組織就緒后，代表等就赴京請愿。国民党中委白云梯、克兴額等想利用晋京代表請愿的声势和蒙旗地方实力的支援，特懇愿軍政部长何应欽来电邀我赴京洽商蒙事。蒙藏委员会总务处长陈敬修也来北平迎接班禪赴南京，特到嵩祝寺見我，表示欢迎我和班禪同車南往。这时吳鶴齡已被蒙藏委员会委員長石青阳解除了蒙事处处长职务，調任参事閑散之职，并命令他重选蒙旗代表，改組办事处。吳鶴齡在

这种压力之下，感觉对他不利，就匆忙地由南京赶来北平，請于华亭（蒙名罗布桑車珠尔，系吳岳父之喇嘛弟弟，后还俗为鎮国公）出面奔走联络，托班禪的堪布和烏兰察布盟的德瓦根敦等为我们居中調解，吳鶴齡偕同于华亭曾亲到嵩祝寺和我見面，接着又由班禪出名宴請我俩，堪布們代表班禪陪同我俩聚餐，劝我俩合作。继又由德瓦根敦、拉希色楞等出面在攝英番菜館邀請我俩宴会，进行調停，但我俩均未表示接受。

我和班禪同乘专車到达南京后，一面見何应欽洽办請拨武器之事，一面和晋京請愿代表商洽进行反对吳鶴齡、改組办事处之事。桂永清更是时来看我，陪同我往見以关心边事自居的考試院长戴季陶，桂以“蒙古通”自居，向戴介紹說：“我曾亲到錫林郭勒盟各旗訪問，知道錫林郭勒盟各旗王公均唯德王馬首是瞻。”

吳鶴齡托請巴文峻出面調解，巴曾到中央飯店見我說：“吳鶴齡业已表示愿意奉令改組办事处，他只担任卓索图盟代表，其他各盟旗代表均由新代表担任。”我没有接受巴文峻的調停，并內定补英达賴为新的办事处处长，准备接收。后来因白云梯与石青阳爭权夺利，改組办事处之事就被擱浅下来，我表示要整装回蒙，以相对抗。

为时不久，蔣介石由武汉返京，先在勵志社宴請我和各代表，继又叫桂永清通知，在軍官学校单独召見我，届时由桂永清陪同我前往見蔣。寒暄后，桂永清就把建立中央軍官

学校张北分校計劃递上請蔣閱看。蔣略加翻閱即放在一边說：“現在決定在张北設立分校（张北分校后来沒有办成），特派桂永清按照黃埔的精神办理，培养蒙古方面的軍事干部人材，好做編制蒙古騎兵师的准备。”继又說：“蒙古王公制度是可以存在的，希望不要为此操心。”

現在回想起来，桂永清到我旗訪問时为什么向我建議組織蒙古騎兵呢？嗣到武汉見蔣时为什么楊永泰又提出給我蒙古保安統監呢？后在南京見蔣时为什么又提出建立张北分校呢？据我現在的看法，蔣介石这样重視我，是有原因的，对我职位問題上前后有了变动，也是別有用心的。因为在民国十九年閏、馮倒蔣失敗后，閻錫山特派赵太东、仲躋翰二人由蒙入道布頓（曾任察哈尔一个旗的总管）当翻譯，想通过我旗前往外蒙，被我旗防卡盘查扣留。我曾将此事告知察哈尔省主席刘翼飞，我想刘翼飞定告知张学良和蔣介石。从此蔣介石对我可能有了印象，想爭取我作为他統治蒙古的助手，并认为我旗是通往外蒙的要冲，有組織蒙古騎兵进行“防共”的必要，同时在蒙古組織起一部分武力，对于附近的杂牌軍队也发生牵制的作用。所以蔣介石特派桂永清亲到我旗察看情况时，有向我建議組織蒙古騎兵之事。嗣到武汉見蔣时楊永泰又提出要給我蒙古保安統監名义，不給蒙古騎兵师长的实权，是想利用我作招牌，不愿叫我掌握实力，所以以后在南京見蔣时又提出建立张北分校的計劃，而叫桂永清为他培养軍事干部掌握实权，叫我担任空洞的保安統監的具

体措施。記得在北平解放，我到南京时，桂永清已当上了海軍总司令，特在他的家里招待我宴会，并請国防部五个厅处长、国民政府一个管軍事的局长和白云梯等作陪，他情不自禁地流露說：“如果依照我从前的計劃，在內蒙組織起来五万騎兵，东北不会叫共产党拿去，也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接着他又向我介紹在座的厅处长：这位是主管軍械的，那位是主管电台的，說我如有所需要时，請向他們各位进行接洽好了。通过这一段談話，足証蔣、桂有意叫我組織騎兵，是以“防共”为第一要义的。其后我在阿拉善旗发动“西蒙自治运动”，前往广州請愿时，桂永清特又給我机关枪四挺、步枪二百枝，也是想利用我在內蒙組織“反共”力量，为他們效力，作垂死的掙扎。

在南京見蔣后，我即将韓凤林留下在軍官訓練班当教官，并以需用軍事人材为名，向高級教育班交涉要出了正在受訓的蒙古学生云继先，又向軍政部洽領迫击炮二門及补发武汉行营許可的步枪几百支，还到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参观，和正在求学的蒙古青年做了接触，以期对我有深刻的印象。这时我对于改組办事处之事已感冷淡，又不愿再陷入白云梯等爭夺权位的旋涡里，遂分別到各机关訪問，各机关首脑也分別宴請我，这样应酬聯絡了几天。这时外蒙的逃亡者迪力瓦还在南京，我和他常相过从，有一次我問他：“內蒙搞自治可以不可以？”他答說：“外蒙既可以进行独立或自治，內蒙为什么不可以自治。”这几句話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不

愿再在南京作无味的政爭，就偕同一部分代表北返。另一部分代表参加了办事处的改組。吳鶴齡的处长改称主任，这一場政爭就这样結束了。記得当时報紙上登載着“德王等晋京請愿未遂，拂袖返蒙”的消息。我这次竟落了一个乘兴而往，負气而归。所以到北平后，又和旅平蒙古知識青年作了广泛的接触，招收了二十余名蒙古学生，由云继先和于福庚、云敬圣帶領着，随我一同返归苏尼特右旗，着手培养人材和力量，备作待机而起的政治資本。从这一段經過中，說明我武汉見蔣是想取得蒙古的軍权，赴京請愿是想取得蒙古的政权，但均未如愿以償，于是便想归来搞自治，实现我的政治野心。

我回旗后，即在西营盘成立了蒙古干部学生队，委派云继先、于福庚二人为教官，把从北平招来的学生一律編入該队受訓，把从武汉和南京所領到的武器拨归該队应用。这时我认为即使中央軍校张北分校成立起来，毕竟是国民党中央的系統，一切須受他人的监督，不如自办一个学生队，訓練自己的干部方便。不久，陈紹武、陈国藩、霍宝书、烏鵬、王泽春由綏包一带前来苏尼特右旗，丁我愚、亢仁等也相继前来。我正招致青年来归，当然力表欢迎，推誠相与，常相聚談，共同研究討論怎样对待当前紧张时局下的蒙古問題，决定由錫林郭勒盟联合烏、伊两盟发动內蒙自治。这时我儼然以青年領袖自任，以期出問蒙事，掌握大权。

二

我虽然罗致了一部分蒙古青年做为我的臂助和基干，但自知我的职位不过是副盟长，声望不高，年紀又輕，不能領袖群伦，号召各盟旗参加，必須得到年高、“爵尊”之王公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在錫林郭勒盟进行自治，首先必須取得盟长索王的贊同和楊桑（楊桑曾任过錫林郭勒盟盟长）等老年王公的諒解。楊桑向以我的前輩自居，认为我好大喜功，时常流露不滿之意，曾有“錫林郭勒盟出了一个苏尼特王，不知什么时候闖下乱子，錫林郭勒盟前途殊堪忧虑”之語，盟长索王对我也是不滿的，因此，必須設法說服他們同情自治，最低限度不致出头阻撓自治。經我反复思維，认为通过班禪來說服他們是个最妥善的方法。这个方法还是郭道甫和我談过的。

記得在一九二九年我随同班禪去沈阳面見张学良洽拨武器，曾与郭道甫（这时郭任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校长）見面，常相过从，他曾对我說：“外蒙和內蒙情况大致相同，为什么外蒙独立成功？是因为有哲布尊丹巴这个宗教領袖，在蒙古民众中形成了中心信仰，反观內蒙历次抗拒开垦或独立运动都归失敗，是因为各自为政，形同一盘散沙，沒有中心信仰，以致历次运动无一成功。現在听說班禪的堪布們正請中央用武力护送班禪回藏，一时尚恐不能实现。趁此机会，应

当联合各旗集資在蒙地为班禪建庙，請班禪留在內蒙，做为宗教領袖，形成中心信仰，对我们进行蒙事，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他这个建議，我很以为是，返归錫林郭勒盟后，即和盟长索王商量，索王也极表同意，当派我和松津旺楚克（浩济特左旗扎薩克郡王）代表錫林郭勒盟前往北平聯絡各盟旗王公商洽为班禪在內蒙建庙，挽留班禪在內蒙长期居住，各旗王公一致表示贊成。适这时班禪在北平，郭道甫也来平公干，我們就去面見班禪，确定在錫林郭勒盟和哲里木盟各建一所庙。嗣因“九一八”事变发生，哲里木盟已經淪陷，遂将各旗集資十万余元，在我旗和烏珠穆沁右旗为班禪建庙二所，在一九三一年并請班禪前来我旗过冬，一九三二年夏在錫林郭勒盟各地唸經。因此，既取得班禪对我的好感，也使錫林郭勒盟各旗王公对班禪有深刻的印象。

迨至一九三二年，我正和青年們研究进行自治，設法說动索王同意时，班禪由烏兰察布盟百灵庙前来我旗，并要去貝子庙、烏珠穆沁右旗等地唸經，我认为机不可失，遂請班禪帮助我，同他前往烏珠穆沁右旗，說服索王。在我們沒有到达之前，听說日本关东軍參謀田中久曾帶同蒙語翻譯金永昌前来劝說索王赴“滿洲国”參觀，并要求在烏珠穆沁旗設置特务机关，安裝电台。索王因“九一八”事变后，曾派人到过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向凌陞探詢日本对蒙旗的情况，凌陞曾答复索王說：“日本最厉害，我們与任何人合作都可以，但不能与日本合作。”因此，索王对日本存有戒心，遂应付

說：“你們日本有力量你們就設，要征詢我的意見，我是不同意的。”并推托身体肥胖，動轉維艱，不能前往，可派協理胡圖里前往奉天、長春等地一行。田中久等走后，我陪同班禪到達烏珠穆沁右旗，索王對我提起田中久前來要挾設置特務機關和電台一節，甚感頭痛，乏于應付，問我怎辦，我不敢同他直接談自治的事，答復他說：“班禪佛爺正在此地，何不請求佛爺指示明路。”索王就同我去見班禪，請示對策。班禪即答復說：“前次德王和我說的聯絡錫、烏、伊三盟會商蒙事很好，現在正是時候了，積極去做就對了。”索王當下也表示贊成，于是第一步說動成功，就請索王以盟長名義做出公文，蓋上盟長大印，派我代表錫林郭勒盟去見烏蘭察布盟盟長雲端旺楚克（云王），后又加派烏珠穆沁旗的協理若樂格爾扎布一同前往。我遂偕同亢仁、丁我愚、阿樂騰格爾勒等馳赴百靈廟，先派員與云王送去公文并向云王表達請其出而倡導自治之意，云王當時還徘徊不定。恰于此時，蒙藏委員會蒙事處處長巴文峻等一行前來宣撫，經由四子王旗等地到达了百靈廟，亢仁當將我等候云王前來研究倡導自治問題告巴，我也請巴去勸說云王早來。巴文峻雖然身負宣撫蒙旗歸向國民黨中央的使命，却對內蒙古自治也盡心贊助。他在南京時，曾參加過參謀本部邊事研究組，討論過這一問題，知道地方自治性質的內蒙古自治，尚在國民黨中央許可之列，遂允前往勸說云王，云王這才表示愿意與我共同倡導自治，當率同其弟根敦扎布和仕官們沙拉巴多爾濟、那遜瓦齊爾等

前來百靈廟。這時烏珠穆沁右旗台吉若樂格爾扎布亦趕來參加。遂於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在百靈廟舉行了第一次自治會議，八月二十四日發出通電。當時潛伏在我旗廟上冒充喇嘛的日本特務人員笹目却向韓鳳林說：“你們發動自治太早了，時機還未成熟，不如我們日本軍的力量到達這裡時，再進行發動自治為宜。”足見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們向國民黨中央要求自治，不感什麼興趣，而是企圖在日本的卵翼之下進行自治。九月二十八日召開了第二次自治會議。其後黃紹竑、趙丕廉來百靈廟，經過許多周折，雖然爭得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一般稱百靈廟蒙政會）的組設，但我們極不滿意。當下決定除通知各盟旗選定晉京代表要求許可內蒙自治外，並派陳松山（蒙名布仁巴雅爾）前往包頭面見孫殿英，請其支援自治。據他回來報告說：“我見孫殿英後，力表內蒙自治絕無其他背景，純系蒙人迫切的要求，以期把各盟旗團結起來，實行御侮圖存，請大力支援。孫殿英甚表同情，並說就是內蒙自治有外人背景，也沒有什麼關係，他仍盡力支援。”同時我又派韓鳳林前往北平日本大使館分支機構，探詢對內蒙自治的態度。韓鳳林回來報告說：“我到北平曾見着日本大使館的柴山武官，請支援內蒙自治，他說現在中日之間存在的問題很多，不斷發生衝突，但仍保持邦交，內蒙自治系中國內政問題，日本不便出面干涉，言下頗為冷淡，對內蒙自治似乎不感什麼興趣。”我聽到韓鳳林報告後，認為柴山武官是日本的外交人員，不便表示對內蒙自治的態度，乃又派

补英达赖前往伪滿面見溥仪，并通过溥仪的介紹与日本关东軍吉岡安置參謀接洽，托辞购买枪支，探詢日本关东軍对內蒙自治的态度，沒有得到明确答复而归。

三

百灵庙蒙政会成立后，仅領到开办費两万元，用以維持办公和職員的生活，每人支給十五元生活費，仅够伙食之用。这样勉强維持，終非久远之計，即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有關部門請領經常費和建筑費，但尽管函电交催，亦无結果。我为了解决这个面临的迫切問題，特密派陈紹武前往廬山面見蔣介石，一則报告日本人进出西蒙，請示如何对待，再則請撥經胎各費及枪械电台等物，以济急切需要。結果得到蔣介石的答复，准予撥給經常費每月三万元，建筑費十二万元及枪械电台等物，囑向南京有關部門洽領。至于怎样对待日本人进出西蒙問題，蔣介石答复要以不亢不卑的态度相机办理。并囑陈紹武轉告我，他不久即来綏远巡視，請我和云王前往相見晤談，还叫陈紹武給我带来他的复函一封，內容也是对陈紹武所說的大致相同。

不意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韓凤林被捕事件，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据我了解有三：（一）在蒙政会成立之后，我派韓凤林为保安处第一科科长，云继先为第二科科长，朱实夫为第三科科长。当由蒙政会下令叫各盟旗选送蒙兵，責成